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5.11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反思^[笔谈]

编者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五四运动开端,迄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百舸争流的学术发展大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激流勇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示了自己的学科个性、学术个性和学术追求,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深入发展,如何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已经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飨读者。我们深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以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K03、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1)05-0073-12 收稿日期:2021-01-03

坚守与拓展: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思考

李 勇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新史学的重要分支,是书写 20 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界将其研究同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或者说在中共党史视域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按理说自然会呈现显著的规定性,不过就可操作性而言,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加以思索。对此,不少学者曾有探讨^①,对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富有启发。然而,一些问题尚待具体说明和分析。例如,从纯粹学术性角度加以研究会碰到怎样的局限,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个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长期坚持唯物史观外,是否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专业理论?诸如此类,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

大多数情况下,史学界从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着眼,去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②,这也是长期以来的基本做法。这一做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就是从学理演化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的角度去研究学术史。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把两者隔离开来进行研究的现象。一方面撇开社会因素,单纯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著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另一方面无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而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① 吴志军《“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8 期;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陈峰《中共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②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年;瞿林东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于沛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从纯学理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体系、逻辑结构和观点等问题加以梳理,无法深刻而全面地呈现其社会意义。例如,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按照这一思路,当然可以清晰地发现“动力”“新生命”“新潮”诸派学者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关于唯物史观的不同表述,使用不同乃至同样史料,论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分析其社会性质,形成五花八门甚至截然对立的学说。但是,如果不联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各派对中国前途的思考,不联系各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态度,不联系各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的选择,那么对于各派学说的社会意义的判断、对于这场大论战的价值估量,就难以得出恰当的结论。而过于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纯粹把它视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喉舌,就会掩盖其学术贡献。如按照这一套路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那些使用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家不是中共多数派,就是中共托派,再不然就是国民党派,他们都是在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本集团作政治宣传。这一纯粹从政治宣传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成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的学者,特别是1949年以后台湾、香港地区和海外一些学者,轻蔑乃至彻底否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把柄。

事实上,从社会因素看,中国社会史论战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革命的问题;从学术因素看,这些史家在搜寻史料、引述经典、解释中国古史体系时,体现出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总之,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离开任何一个特性来认识它,都是片面的^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求真与致用相结合,既是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又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实际上,20世纪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史料搜求派也未完全脱离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旨趣,更毋庸说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致力于对文化传统的坚守了。

学术界长期从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似乎给人以老生常谈的印象,于是单方面强调其学术性或革命性,成为一种新的偏好。从逻辑上说,这种片面强调当然是不当的,但是,片面研究所导致的细致性的研究成果,却是可以借鉴和利用的,使之作为着眼于双重属性的研究服务。如郭沫若扬孔抑墨问题,细致考察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与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的有关认识相比较,可以把郭沫若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梳理得非常清晰。但仅止步于此,仍然无法合理解释郭沫若何以扬孔抑墨。实际上,郭沫若每次发表关于孔、墨的言论,都赶上蒋介石集团尊孔祭孔、右翼学者宣传文化保守主张,客观上与之合拍,可能为其所用。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郭沫若的史学同道即中共党内史家对他批评不断了。如果细致揭示郭沫若与其同道的学术差异,再纳入社会政治框架中去认识,那岂不是可以得出郭沫若研究孔、墨的更深刻而又恰当的认识吗?

总之,时至今日,从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意义上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不但是一条有效途径,而且是恰当的着眼点,今后的研究仍需坚持。

二、坚持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既需要众多个案研究,又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事实上,以往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论文和专著,大多聚焦于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等这些顶尖史学家身上,关注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历史哲学教程》《中国思想通史》等史学经典,重视类似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样的史学事件,热衷于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殷周社会性质”这样的理论问题。这些属于史家、史著和专题的个案研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最基本方式。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作整体性研究。如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侧重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瞿林东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聚焦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变革和指导作用;于沛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不少篇章以史学思想为线索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第七、九两章,论述唯物史观思潮的传播与影响,总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条件、初盛与成熟、成就与发展,是着眼于思潮与学派相结合的整体研究的一个范例。

^① 参见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陈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张越《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个案研究有利于做深做细,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整体研究可以贯穿个案研究,有助于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全貌。因此,以往的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都是可行的研究方式,都值得坚持。

不过,在这两种研究并行的前提下,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未来的研究,就史家和史著而言,不仅要继续研究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和侯外庐这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著作,并且要研究李达、吴玉章、杜国庠、陈伯达、华岗、李平心、吴泽、胡绳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著作。此外,20世纪有不少学者,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一个时期确实使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历史并写出有影响的著作,例如陶希圣及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李季及其《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批判》等,这些史学家及其著作也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有些学者早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1949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之研究历史,如董书业、罗尔纲等人,其后期的史学活动也应当纳入研究范围。

二是从史学交流与传播的角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学人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为工具来研究历史的产物。从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中国学人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舆论气候下,这一倾向得到强化。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加大、学术研究向纵深的发展,学界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史学走向的影响^①。同时,海外中国学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大陆学者开始注意欧美学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域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广阔前景显现出来。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还比较薄弱。

三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的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出版过许多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出版后遭到不少批评。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引起学界强烈批评^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也受到学界批评^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有类似遭遇。这些批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都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自我完善的动力,自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理应得到重视。

三、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性的研究

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过于注重对其共性的考量,强调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特征,关注其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突出其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特色,肯定其为中国革命鸣锣开道的社会意义。无疑,这些研究抓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共同的基本面相。

可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在同一个时期也存在着对于中国现实的多角度的认识,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这些都是必须涉及的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共产党营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也有不同面相,同一时期不同史学家的理论和观点也未必完全相同。遗憾的是,过去的研究在这方面是缺失的。因此,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个性,是未来要着力开展的工作。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确有不同的个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关于殷代和周代社会性质,他们就有不同见解。郭沫若先是认定殷代为原始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后来发展为把殷代和周代都视为奴隶社会,而吕振羽、范文澜等人却认定殷是奴隶社会而西周是封建社会。再如对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历史的性质,李平心说是殖民地化社会,吕振羽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郭沫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范文澜先是说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后来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关于孔子、墨子的看

① 张广智等《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② 王瑞《论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理论月刊》,2012年第12期;吴原元《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李勇《欧美学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3期。

③ 李麦麦《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读书杂志》,1932年第6期;程憬《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图书评论》,1932年第2期;王扶生《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质疑》,《中国革命》,1934年第24、25、26期;马伯乐《评郭沫若近著两种》,《文学年报》,1936年第2期;易白丁《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道月刊》,1943年第8期;尹达《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众》,1945年第7、8期。

④ 白寿彝《评〈中国通史简编〉》,《文讯月刊》,1947年第3期、1948年第1期;杜呈祥《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央周刊》,1947年第45期;缪凤林《揭开它的伪装揭露它的真相——评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央周刊》,1948年第5期。

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存在差异。郭沫若认为孔子以人民为本位,是奴隶解放的代言人,而墨子是以帝王为本位的,是反动和落后的;翦伯赞、杜国庠、杨荣国等人恰恰相反,认为孔子代表没落的“封建”势力,而墨子是反“封建”的工商业者和农民阶级的代表。

造成这些认识差异的原因很复杂,不过,大体上可作如下归纳:

一是所依据的理论来源不同。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中吸取理论养分,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关注的重点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看法有侧重,表述有时也不太一致,这就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待同一问题时,观点可能相同但也更可能迥异。

二是对史料的解读不同。如他们解读西周的劳动者,郭沫若把周代的“众人”“庶人”解释为奴隶,而范文澜等则把他们解释为农奴。再如吕振羽、范文澜把西周的“封建”理解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形态,而郭沫若则依据“封建”的“封诸侯,建藩卫”之义,认为它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三是对政治性术语理解不一。例如关于“革命者”,就存在着“革命者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革命者”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样的疑问。郭沫若把“革命者”理解为推翻现存政权、现实社会的造反者。他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权易手,是由孔子后学、后人和朋友引起的,所以认为孔子是革命势力的代表。而翦伯赞、杜国庠等人把“革命者”理解为工农群众,认为墨子及其后学衣食简朴、品格坚韧、反对战争、勇于献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代表,当然就是中国的革命者。

四是各自的假想论敌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针对历史问题,一般有假想的论敌,如郭沫若研究先秦诸子以胡适为论敌,而杜国庠则以冯友兰为论敌。胡适打孔扬墨,郭沫若则扬孔抑墨;冯友兰鼓吹新儒学,杜国庠则扬墨批儒。这样,郭沫若和杜国庠关于孔、墨的观点就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

总之,以上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同道们,最后的具体观点却五花八门。因此,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就必须关注这些个性,找出他们怎样使用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句,对史料作出怎样不同的选择,对同一段史料作出怎样不同的解读,对于一些政治性术语有怎样不同的理解,还有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假想论敌。只有这样,才能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共性之外的个性这一面相。这说起来很简单,其实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付出更为艰辛的学术努力。

四、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理论史的探讨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学界已经作过研究^①。但是其学科理论史,同样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够,有待加强。

历史学性质理论史值得厘清。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等著作中,对于历史学的科学属性、社会功能有系统论述。其后,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论及这个主题,特别是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史学学科论述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仍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论述这个问题,像郭沫若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改革开放后,各种“史学概论”之类的教科书都涉及历史学的概念、功能问题,有的还涉及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一个方面,历史学性质理论史需要加强探讨。

史料学理论史值得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期被认为在史料搜集、考证和解读上存在不足,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毋庸置疑,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绝不等于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缺陷。相反,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史料,且形成了自己的史料学理论。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有关于神话、甲骨文史料的论述;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讨论神话史料,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开篇就论述史料选择的问题;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之《序言》讨论过金石、甲骨和神话史料问题;其后,翦伯赞《史料与史学》、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齐世荣《史科学五讲》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之代表作。其他涉及史料学的还有各种“史学概论”中的相关内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史料学教科书中的论述,各种马克思主义专门史史料学教科书中的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史料学的论述蔚然可观,需要加强梳理。

历史编纂学史值得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编纂理论非常丰富,其中的通史编纂理论就值得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都重视历史的贯通研究,曾经编著多种中国通史著作,像翦伯赞《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等。在世界史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出版多部世界通史,且有一个从五种社会形态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无论中国通史还是世界通史,都涉及如何编纂通史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既涉及体裁方面的宏观问题,又关乎凡例方面的微观问题;既包括历史观,又涵盖技术方法。因此,从史学发展角度对它们进行总结,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活动。特别是在中国通史领域,“无奴说”复兴、“封建泛化论”流行、“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遭受全面的挑战;同时,如何书写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如何体现中国历史在全球史中的意义,对于世界通史的撰写提出新要求。一言以蔽之,为推动新时代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编纂,研究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理论显得尤其必要。

总之,以往学术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着眼于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恰当的认识角度;学术界既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个案研究,又进行整体研究,都取得重要成果,可视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这两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仍需要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认识这些个性对于全面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十分重要,可是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理论,诸如史学性质和功能理论、史料学理论、通史编纂理论等方面的历史,以往学界也关注不够。这两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加强,这种加强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拓展。有坚守,有拓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辩证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自得与自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自我修养的新境界

马艳辉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关于史家修养的认识源远流长。唐代史家刘知幾提出才、学、识的“史才三长”说,其后清代史家章学诚又为“史才三长”补充了“史德”论,使得才、学、识、德成为中国古代衡量史家修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自身史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和发扬了古代史家修养论,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治学上的“自得”追求和对于学术上的“自省”精神。目前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①,但缺乏专门的梳理和总结,故而拙文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自我修养的新境界作初步总结,并为当代史学工作者提供借鉴。

一、治学上的“自得”追求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史记》的撰述目标。其后,唐代史家刘知幾批评官修史书的弊病,期望“深识之士”能“成其一家,独断而已”^②。宋代史家郑樵提出“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③。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反复强调“别识心裁”与“独断之学”。由此可见,在史学工作上追求“成一家之言”“自有所得”“独断之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危难,中国社会出现剧烈的变革,中国史学亦从传统走向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初步发展,涌现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这个史家群体从一开始就走着一批判、继承、创新的治学之路,自觉将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把传统史家的“自得”之学发展到现代意义的学术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

① 瞿林东:《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徐国利、李庆祥:《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4页。

③ 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纸”，“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①。可见，郭沫若撰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在治学上勇于创新，是敢于填补“白页”的“自得”之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广泛而长久的影响。嵇文甫认为该书“是震动一时的名著”，“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②。张荫麟则认该书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研究路径”^③。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1936年评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这两部书：“表示出强毅的精神，鲜明的思想力，广博的学力。即使他对欧洲科学方面的认识不及他在本国旧学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并用中西方法的努力，并且加入欧洲社会学的理论来革新中国国故学的研究。”^④何干之则认为郭沫若的研究，“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是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⑤。顾颉刚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⑥。从这些评论来看，学界对于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展现的创新性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

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郭沫若在治学之路上一直追求创新，自称“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的发刊词中强调说：“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这不仅是郭沫若对个人治学道路的概括性总结，也为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1934年，吕振羽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利用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史前社会，1936年他又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同于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吕振羽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西周封建说，成为又一重要的古史分期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翦伯赞评价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⑧可见，吕振羽在治学上敢于创新，提出新问题。他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说：“做学问……要有提出新观点的勇气和魄力，但是下一个判断一定要详细的事实材料做依据，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发现错了就要改。决不能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他在指导青年人治学时，提出“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既不标新立异，同时也反对保守，不为以往的结论所束缚。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敢于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⑨。

1938年，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这是当时唯一一部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述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专门著作。翦伯赞在序言中说：“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提出“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还存在着许多荒原区域，需要继起的历史家，从事于历史科学之拓荒运动”^⑩。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翦伯赞认为：“每一个社会或阶段，都有它们独特的典型的東西”，“典型总是从萌芽的东西发展出来的”，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页、第7页。

② 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1年10月12日。

③ 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2年1月4日。

④ 马伯乐：《评郭沫若近著两种》，《文学年报》，1936年5月第2期。

⑤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第104、105页。

⑥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⑦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⑧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

⑨ 王忍之、刘海藩主编：《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83页、第300页。

⑩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第7页。

“不找到萌芽,就无法说明典型的的东西”,“要善于从历史上发现新的萌芽的东西,但不能因为看见了一片落叶就说秋天到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至少要多看见几片落叶,才能说秋天到了”^①。

1942年,范文澜出版《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下贯通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著作。由于该书是在图书资料缺乏、适应抗日时期需要和时间紧促的情况下写成,出现若干缺陷,然而“比起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却是本质上不同,许多写法在旧类型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②。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在治学上倡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提出“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③。他提倡史学工作者必须养成向困难进攻的无畏精神,“在学术工作中避难就易,是缺少志气的表现。有志者当攻克前人未曾攻克的难关,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难题”^④。

1944年,侯外庐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该书在1946年再版。侯外庐在再版序言中评论了郭沫若等人的著作,认为“诸书……皆有独创研究,相得益彰”,虽然学人们的观点各异,“然而,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了”,“关于本书,就是在写作的当时,亦按照这一路径去布置篇幅,不为古人所役,亦不为欧美先进所役,著者委实实验讲我自己的语言”^⑤。由此可见,侯外庐在治学上的追求是要从“仿效”或“模仿”走向自我创造。后来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说:“我的研究重在阐微决疑……所谓‘决疑’,就是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对于社会史和思想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我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特别关心的重点”,“在治学态度上,我赞赏古人提倡的学贵自得精神……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而无所作为,是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我之所以重在阐微决疑,目的在于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所创获”^⑥。

综上所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治学旨趣各有不同、学术观点也各具特色,但他们在治学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追求“自得”之学。他们不泥古,也不盲从西方,而是潜心于继承和创新,这些治学经验对于当前的史学工作者提高自身修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学术上的“自省”精神

同治学上追求“自得”相呼应的是,老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学术上都强调“自省”精神,即“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这是其关于自我修养的又一个特点。

郭沫若于1945年出版《十批判书》,第一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即是对自己以往研究的自我反思。他谴责自己,认为早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⑦1954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引言中再次进行自我批评道:“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把自己的错误袒露出来,对于读者可能也有一些好处。”^⑧可见,对于自己过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郭沫若并不讳言,而是认真地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的学术见解,只有经过不断修正,才能更加成熟……一个科学家、学术工作者,当有了新的材料发现,有了新的看法,就应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⑨这也许是被批评者所诟病的郭沫若

① 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页。

②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6页。

③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9—220页。

④ 蔡美彪:《学习范老,发扬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⑤ 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8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⑥ 侯外庐:《史林述学——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文史哲》,1982年第5期。

⑦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⑧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⑨ 郭沫若:《同广东史学界人士亲切谈话广泛交换关于学术工作的意见》,《文汇报》,1962年1月7日。

观点“多变”之原因。对此,侯外庐的评价更为公允:“他做学问不孤守一说,偏执己见,常常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自己认识的提高,不断修正自己的结论。他不但勇于创新,而且敢于坚持真理。”^①

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初版自序中说:“我愿意诚恳的去领取学术界前辈和读者的批评——不论是善意的或是恶意的——使我知道去改正。其次我在我的研究中,对几位前辈的意见,不免尝有所指摘和批评,这并不是对个人有何憎恶,或完全想把他人抹煞;而是在想把问题弄明白。”^②他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中认真接受对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批评,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省,“我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者的意见,将于拙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即原计划中之《中国社会史纲》第一分册)重订时尽量吸取进去,并仍希学术界前辈和读者不断给予指正”,“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的:一、对‘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我前此的见解是错误的……三、我自认为一些较次要的缺陷的地方,亦一一将于重订时改正”^③。他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6年修订版序中,阐述了进行自我批评的意愿,“我曾经有一个打算,想把自己过去对中国史的系统见解,重新检讨一遍。特别在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出版后……我一面衷心钦佩郭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一面感谢他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去检讨一遍”,“同时,我恳切的要求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以及我的史学同道,希望帮助我对我的中国史见解进行系统检讨”^④。

翦伯赞在回顾自己的研究时,对于以往个人“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省,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办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对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⑤

1951年,范文澜作长文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自我批评,提出该书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有“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并从九个方面自我检讨与说明,“此外没有检讨到的问题当然还有,需要自己更深入的作检讨,找出全部错误来”^⑥。范文澜不仅自我批评,还论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术上的重要性。他说:“学术批判本来是研究工作中的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研究者和批评者不论知识多么广博,要做到自己在每一点上都十分正确那是很困难的。经过批评讨论,才有可能取长补短,精益求精。”^⑦因此“只有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才能治好百病,求得进步”^⑧,“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因而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条文神圣的态度。前者得到进步,后者拒绝进步”^⑨。

侯外庐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自省”的精神。他说:“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又说:“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那怕在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⑩

综上所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自身修养,在治学上追求“自得”,在学术上善于“自省”,显示出崇高的学术境界和虚怀若谷的气度,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值得今天的学人汲取。

① 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②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③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4页。

④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1—332页。

⑤ 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⑥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

⑦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⑧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

⑨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⑩ 侯外庐:《史林述学——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文史哲》,1982年第5期。

革命性与科学性: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的价值和地位

周 励 恒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中,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重要著作。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上,还是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方面,这部著作均有其独特的地位。它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和武器,深刻论述了历史存在的特性、历史运动的法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魅力;它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历史实际,思考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它是一部兼具激情和理性、战斗性格和科学精神的史学理论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一、社会史论战、抗战烽火背景下的理论思考

《历史哲学教程》是翦伯赞通过参加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抗战烽火燃起的背景下潜心撰写的力作。始撰于1936年春季,1938年8月由长沙新知书局出版。该书出版前,翦伯赞将之作为民国大学的讲义在课堂上讲授过,并经徐特立审阅。1939年8月在出版社的要求下再版,增加了《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再版代序”。初版本14万字,再版本约16万字。

翦伯赞是通常所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书斋。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思想文化界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未来前途发生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国民党新政权的御用文人以及托派理论家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中国已经独立,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无需再进行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这次大革命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国民党建立的一党专政只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快在学术思想界展开。由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引发中国古史问题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社会史论战由政治论争而引发,带有政治与学术紧密交织的特点。翦伯赞积极参加了社会史论战,发表了大量论文。此外,他与吕振羽合作,撰写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13—1932)》,以及带有批评性的史学理论文章。社会史论战时期,翦伯赞对于马克思主义,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对于历史则是“现卖现蒸,现蒸现卖”^①。数年的勤奋学习和执着探索,终于使他成长为一位知识渊博、举足轻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翦伯赞写作《历史哲学教程》,既有社会形势的迫切要求,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首先,抗战形势的需要。他说:“现在,我们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②即是说,战胜日本侵略,实现民族复兴,迫切要求建立起正确的历史理论,以指导抗战,而且还必须从历史哲学上清除抗战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赖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其次,对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的理论是非进行澄清,尤其是实验主义的新历史考据学派。此外还有历史的形式主义者、经济唯物论者等,对于历史理论,都有程度不同的错误理解。这些错误不仅“对于历史科学的本身是一个污蔑”,而且在实践上对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更是一种毒害。第三,为历史研究提供正确的方法论。翦伯赞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③

① 翦伯赞:《翦伯赞致欧阳敏纳的十三封信》,《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http://www.cnki.net

②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③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上述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通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社会史大论战引发的问题促使翦伯赞做更高层次的理论工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中国由此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台。中华民族到底是衰亡还是复兴,此刻到了关键节点。《历史哲学教程》正是翦伯赞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姿态,怀着必胜的信念,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晶。

二、唯物史观的历史阐释与历史的唯物史观论述

《历史哲学教程》既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又是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的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的双向阐释和论证。

除了《序》《再版代序》,《历史哲学教程》包括六个部分:一、绪论;二、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三、历史的关联性;四、历史的实践性;五、历史的适应性;六、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这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属于狭义的史学理论范畴,即对历史科学自身的论述,讨论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历史科学的阶级性”。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论述历史理论。第六部分是关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所谓“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就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它表现为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历史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发展。“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却包含着最复杂的现实内容。它是从几千年来各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法则。”^①“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②历史的一般法则与历史的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历史的研究不仅是探求一般法则,而且探求特殊形式,不仅要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绎出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多样性。

所谓历史的关联性,是指历史要素的相互联系,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之纵的发展中,同时也包含着横的发展,历史之纵的发展与横的发展之相互的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相互的作用与统一,构成具体历史的客观的全面。”^③

所谓历史的实践性,是指历史是过去全人类生活斗争与其创造之实践的成果。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一切社会,不管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只能作为人类在其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生产及交换关系之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人类预先设定了的一种‘绝对理性’之实现”^④。所谓历史的适应性,是指社会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辩证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翦伯赞认为这是历史哲学上基本的重要问题之一。

最后“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是对持续数年的社会史论战的总结,也是本书论述历史发展基本原理的归宿和落脚点。该章从理论上论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未来前途。翦伯赞认为,抗战是中国历史走向另一个变革的开始,是中华民族转变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必将获得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⑤。

总的来看,全书结构严谨,自成体系。理论和历史紧密结合——或从历史的角度说明理论,或从理论出发论述历史,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真正融入历史事实中,用历史学的范畴构建起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框架和模式,从而建立起属于历史学的理论体系。

《历史哲学教程》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翦伯赞从全人类历史和思想史的高度阐述历史原理,广泛涉及中西哲学著作和古今中外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事实。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到近世的“新休谟主义”“新斯宾诺莎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马赫主义”“实验主义”及国外的最新思潮等,他都如数家珍,纵情点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的重要论断,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对中国历史及史著的运用更是如此。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学识的渊博和学术造诣的深厚。

①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②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页。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③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④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该书在阐述历史的一般性的基础上,注意从历史发展诸阶段中考察历史规律的具体表现,揭示历史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如论述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辩证的统一的原理,就依次论述了“适应于奴隶所有者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适应于封建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而且采取中西比较的方法。

该书在批评错误观点的基础上立论,带有鲜明的批判个性。如在讨论历史的实践性时,所设的“从神学、玄学到实验主义的批判”“是经济决定还是‘理性’的体现”“历史的动因是人类的‘意欲’吗”“历史哲学之反动的发展——从‘道德论’到‘暴力论’”三节,都属于这种情况。而更多的是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对相关的中外学术界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对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代言人以及大小汉奸民族叛徒更是作猛烈的抨击。值得指出的是,他对本国学者如胡适、陶希圣、李季、王宜昌以及同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等人的批评等,也是直抒胸臆。该书的这一批判个性,作者自己也很清楚,他写的《再版代序》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本书是带有论战的性质,在我批判的对方没有改变之前,我当然不应作任何改变。”^①

该书强调人的活动,突出人的主观创造性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针对社会史大论战出现的问题,该书重点对唯心论、经济唯物论作了清算。翦伯赞指出,在社会史论战中,“或者沉溺于刻板的公式主义,或者使理论脱离实践,陷于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②。经济史观“完全把客观存在僵死化,把人类之主观的创造作用完全给以否定。所以在究极上,便都要达到进化论、宿命论、不断革命论等等的谬见”^③。“机械论者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其对历史的飞跃的过程只看见死板的经济力量之自然的机械的活动,而看不出人的作用”^④。因此,他在“历史的关联性”中,专题论述了“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在“历史的实践性”中,专题论述了“作为历史实践前提的人类与自然”。

该书体现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高度融合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该书主体是讲历史存在和运动的法则的,是关于历史的哲学。但该书不是纯粹的哲学之作,它把哲学引入历史学领域,在史学范围内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目的在于解决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体现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关怀。如在“怎样理解历史的关联性”一节,他说忽视历史的关联性,“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疏忽,而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严重错误”^⑤。

该书把历史哲学问题的探讨与抗战形势、中国历史前途紧密结合,为民族解放立言献策。作者多次重申,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民族抗战的胜利。“当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反映到历史哲学上,使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结合为一时,历史哲学上的斗争,就成为现实斗争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将来。”^⑥《历史哲学教程》始终洋溢着作者的民族爱国情怀,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

这部著作出版后,引起了热烈评论。当时已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中,知名度较高的有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教程》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专门写成一册书,“可说是在中国出版界里的首创”,而且还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重辩证唯物论轻历史唯物论的倾向^⑦。有的评论者对这部著作表现出的战斗精神非常赞赏,称陶希圣、李季等人因为要用理论来解读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中国历史极尽其杜撰、歪曲、牵强附会之能事。所以把中国历史扰得乌烟瘴气”,而翦伯赞的著作揭露了他们的面目,“完全说明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的伟大,和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⑧,使读者“可以深切了解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究竟,它更告诉你怎样去研究历史,它提供了科学的大众的方法,给予每个被压迫劳动人民去接受历史的领导指示”^⑨。

①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②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③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④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⑤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⑥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⑦ 伏生:《略评〈历史哲学教程〉》,《上海周报》,1939年第12期。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⑧ 胡莫:《书报评介·历史哲学教程》,《新知半月刊》,1939年第12期。

⑨ 子婴:《介绍〈历史哲学教程〉》,《上海周报》,1941年第4期。

现代学者也对《历史哲学教程》的学术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虽然在中国史问题的各种具体观点上还处于开创阶段,但在“运用史学理论建立中国马克思史学体系的探索上,却代表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①。这部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讨了历史学的科学方法论”,“它是哲学,但又与丰富的中外历史实际相结合,使哲学原理变得生动而具体;它是历史,但又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探究和阐明历史研究所应遵循的方法”^②,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都极富学术参考价值。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产生的。1924年出版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但在20世纪2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的毕竟是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由大革命的失败而导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史研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正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并由于社会史论战而产生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郭沫若于1930年最早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开风气者。吕振羽紧随其后,先后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何干之出版《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翦伯赞也发表大量论著,在社会史论战中大显身手,他们都成为史学界的佼佼者和著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中翦伯赞在史学理论方面贡献最大,其《历史哲学教程》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最系统的理论成果。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中,《史学要论》与《历史哲学教程》都属于史学理论性质的著述。从两书产生的背景看,《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期的史学理论成果,当时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旧史学,建立现代史学体系;李大钊从多个渠道吸收、丰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对欧洲近世以来对唯物史观有所助益的进步思想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并用之论述史学的基本问题,史学理论的思想资源显得比较丰富和多元。而《历史哲学教程》的写作是在社会史大论战之后、抗日战争兴起之时,社会形势、学术环境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学深度参与到政治论争中。学术界不仅翻译了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且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也被中国知识界所熟知和阅读。此时出于对国民党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历史哲学教程》强调历史科学的阶级性,突出唯物史观的唯一科学性,从政治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了批判,显示了明显的战斗性格。《历史哲学教程》加强了历史学社会作用的宣传,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③在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融合方面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当然,它的战斗性格和批判特点,令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偏激。

从内容来看,《史学要论》以史学为核心,论述历史认识论,历史学的系统,历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对人生的作用。虽间或论述历史的本体,但主要的内容是史学理论;而《历史哲学教程》所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历史的法则,偏重历史理论。二者虽然都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但基本内容有明显的差异。以西方的哲学分类进行评论,《史学要论》具有分析的历史哲学特点,《历史哲学教程》主要体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特征。

从学术联系看,《历史哲学教程》与《史学要论》虽同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但二者并没有承继关系。《历史哲学教程》没有提到李大钊及其《史学要论》。然而,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又具有一种逻辑关系。《历史哲学教程》在《史学要论》的框架内,充实了历史本体论、历史研究法的内容,在继续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突出了辩证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积极参与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实践性品格更加成熟。《历史哲学教程》经社会史论战孕育,由抗战时局助产,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自己的历史学学科体系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责任编辑 王记录]

① 荣天琳:《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http://www.cnki.net>

② 施德福:《校勘后记》,《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

③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页。